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 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王浩 著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 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王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王浩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205-3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3142 号

责任编辑 刘 硕

封面设计 高海云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王 浩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3 字数 228,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05-3/D·2963

定价 48.00 元

序

金灿荣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在王浩博士的专著《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际，作为他从本科学年论文撰写开始一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我很高兴能为本书作序。

美国对外战略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历久弥新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能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产生十分重要的外部战略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本身的对外行为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动因，涉及国际、国内等多个层面，研究难度较大。因此，从经世致用和学术创新两个维度看，对于美国对外行为逻辑的深入、创造性探索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教益和学理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浩博士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美国对外战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直以来，受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探讨更多地是基于国际体系因素，将美国外交视为体系压力作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上述假设开始日益受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的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仅依靠体系变量来解释国家

的对外行为远远不够,而对于像美国这样超大规模且内部极为多元的国家,国内因素在其对外战略形成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本书以美国国内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结合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三个变量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变迁逻辑的思路,是在综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次重要学术尝试和理论创新。

从社会利益及社会联盟力量对比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美国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正像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进行的国内政治博弈,并非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或意识形态使然,而是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博弈根本上反映出的是美国国内各类政治精英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在外交上相互冲突的诉求。如此一来,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及其实践是对相应国内社会联盟利益的回应,政治精英的对外战略理念和实践会随着社会利益的变迁而进行调整。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实用主义精神的鲜明体现。历史地看,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对美国社会乃至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只注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英国史学家约瑟夫·弗兰克尔(Joseph Frankel)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作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佳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美国外交。

概言之,如果我们沿用教科书式的思维,单纯从国际体系与地缘政治,抑或是文化、宗教和政治原则等来理解美国及其对外战略行为,恐怕会令人头痛不已。然而,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入手,再从国内多元化社

会利益在外交上的诉求,连同由这些诉求决定的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及其政治博弈格局来理解美国、美国精神以及美国的对外行为,或许就会生动许多。因此,本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帮助我们打破了国家行为体的传统“黑箱”,深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层面来理解其对外行为,并且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及其力量对比变迁等明确和可操作的基础上,可以说进一步丰富、深化并完善了学界对美国外交的研究。

王浩自2007年进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开始,一直对美国问题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从本科学年论文一直到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他的研究主题都没有离开美国,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可以说是他九年来在这一领域不断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攻读博士期间,王浩不仅在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还获得了教育部公派出国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深造,在扎实的学术功底基础上具备了良好的国际视野。随着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他开始意识到国内因素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并且有志于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在赴美留学的过程中,他大量搜集和仔细阅读了相关文献,使自己的思路逐步开阔并臻于完善。在此期间,我曾因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数次到访纽约,每一次都与他就论文选题和写作等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从而为他论文写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在博士论文的开题、预答辩、匿名评阅以及答辩过程中,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对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从而起到了更进一步完善的作用。

2016年博士毕业后,王浩开始进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一国内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这既是他多年来不

懈努力的结果,也为他今后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入职复旦以来,他一直将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出版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经过长期酝酿、深入研究和反复修改后的学术作品。作为王浩的博士生导师,我希望并相信这本著作能够引起美国研究学界的良好反响。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因此,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通过系统回顾已有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我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建立在反思体系理论基础上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都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内在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基于此,本书致力于在国际体系变量和国内政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社会变量,以此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且更具说服力的阐释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社会联盟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发挥塑造作用,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归根到底,美国外交背

后的核心驱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突,它们来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非同步性与非均衡性。随着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化,多元化的国内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强政策影响力,进而在与国内竞争者的较量中取胜,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所依靠的那些社会联盟的利益,这就导致国内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了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变迁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政治学因果机制,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根本逻辑。

在上述根本逻辑的基础上,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主要分为三类;与之相应,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研究也应有三种理论视角。首先,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格局的形成,来自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共振效应”,由此导致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基础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便体现为“强国家、弱社

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可以说，这就是当时所谓“冷战共识”形成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分析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即应从体系中心视角入手，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战略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美国国内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内部利益冲突而逐步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随之逐步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也因此兼具了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双重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或“强总统、强国会”）机制。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将国内变量纳入分析范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美国对外战略所体现出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最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的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已经完全取代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进一步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社会力量间的激烈较量左右了国内政策议程，使得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演变为一种“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模式，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漂移或摇摆状态。基于此，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外交实

践的观察与分析应持国家中心视角。

按照上述理论与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支柱——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积极运用。二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的战略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等，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共同致力于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与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战略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赖以运转的美国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渐趋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遏制苏联，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

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核心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的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内部分化,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结果导致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冷战后彻底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随之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由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及其蕴含的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每个发展阶段的实践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系统、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将表明,社会利益及其力量对比格局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并深化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外交的理解。

目 录

序	金灿荣 1
前 言	1
导 论	1
一、“老”问题与“新”视角	1
二、既有研究的综述	9
三、概念界定、核心论点与理论假设	24
四、研究方法 with 结构安排	34
第一章 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进程	50
一、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社会联盟视角：理论与历史	51
二、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外交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理论研究 视角	64
三、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	69
四、小结	74
第二章 构建共识：社会联盟压力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	81
一、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	81

二、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	93
三、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98
四、小结	112
 第三章 走向分裂:社会联盟张力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 ..	120
一、越南战争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根源	120
二、越南战争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	133
三、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衰落:从尼克松到老布什	140
四、小结	158
 第四章 极化:自由国际主义的瓦解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	167
一、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根源	167
二、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	178
三、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瓦解: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185
四、小结	199
 第五章 美国对外战略的现状与趋势:基于社会联盟视角的分析	211
一、奥巴马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新变化及其逻辑	211
二、结论	223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81

导 论

一、“老”问题与“新”视角

1. 本项研究的缘起

200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富汗政府甚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基于此,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3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与此同时,奥巴马在演说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2011年7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是彻底结束战争。^[1]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这次演说传递出一对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塔利班组织形成进一步威慑,是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强化和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18个月撤军期限又极有可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组织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

么它完全可以等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2]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回应奥巴马上述演说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3]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不难发现,奥巴马在作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对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cross-pressures)。一方面,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或国务家(statesman),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party/political coalition leader),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4]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组织的再度兴起进行及时且强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会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标就在于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推行全球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从而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就国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广泛议题和领域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趋势,奥巴马决定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态度,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明确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整体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偏好,对反恐战争进行淡化处理,以最终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

版”的越南战争。〔5〕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战略投入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与之相应,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例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化”(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低效率这一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6〕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则认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是“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7〕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首先,运用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